

阮 炜◎主编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Mari and Early Collective Governance

民主的古代先祖

玛里与早期集体治理

【美】丹尼尔·E·弗莱明（Daniel E.Fleming）◎著

杨敬清◎译

CAMBRID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阮 炜◎主编



民主的古代先祖

玛里与早期集体治理

【美】丹尼尔·E·弗莱明（Daniel E.Fleming）◎著

杨敬清◎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的古代先祖/(美)丹尼尔·E·弗莱明(Daniel E. Fleming)著;杨敬清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675-5949-3

I. ①民… II. ①丹… ②杨… III. 近东—古代史—研究 IV. ①K37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9380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民主的古代先祖

著 者 (美)丹尼尔·E·弗莱明(Daniel E. Fleming)
译 者 杨敬清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949-3/K·479
定 价 6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总 序

我国接触西方古典文明，始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了吸引儒生士大夫入基督教，也向他们推销一些希腊罗马学问。但这种学问像“天学”一样，也并没有真正打动中国的读书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泰西之学”比中土之学高明。及至清末，中国读书人才开始认真看待“西学”，这当然包括有关希腊罗马的学问。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才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一切，激情澎湃地引进一切西方思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才有了初步的认识。

回头看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的引进是热情有余，思考不足，而且主要集中在希腊神话和文学（以周作人为代表），后来虽扩展到哲学，再后来又扩大到希腊罗马历史，但对古代西方宗教、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体育、战争等方方面面的关注却滞后，对作为整体的古代西方文明的认知同样滞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知几乎完全陷于停滞。但从 50 年代起，商务印书馆按统一制订的选题计划，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中便有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译，1958 年、1978 年）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下卷，谢德风译，1960 年、1977 年）。1990 年代以来，该丛书继续推出西

方古典学名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本,苗力田主编,1990—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柏拉图全集》(4卷本,王晓朝译,2002—2003年)。至此,我们对古代西方的认识似乎进入了快车道。但很显然,这离形成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仍十分遥远。

近年来,华夏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其中有不少首次进入汉语世界的希腊原典,如色诺芬《远征记》、《斯巴达政制》等。这套丛书很有规模,很有影响,但也有一特点:有意识地使用带注疏的源语文本,重点翻译有“解经学”特色的古典学著作。在特殊的国情下,这种翻译介绍工作自然有其价值,但是对于包括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西亚、拜占廷)宗教、神话、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在内的主流古典学来说,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一两百年来,古典学在西方已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领域,西方的大学只要稍稍像样一点,便一定有一个古典学系,但是有“解经学”特色的古典学仅仅只是其一个分支。

因市场追捧,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一些古典学著作,但总的说来,这种引进多停留在近乎通俗读物的层次,并不系统、深入,对西方各国近三四十年来较有影响的古典学成果的引介更是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后,中华大地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目眩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必将导致全球权力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玩家。据一些机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20年以前便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不可逃避的态势必将到来,可是中国学术是否也会有相应的建树呢?必须承认,三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但学术建设却未能取得相应的进步,而未来中国不仅应是头号经济强国,也应该是一个学术强国。因此,一如晚清和五四时代那样,融汇古今中外的学术成

果,开启一种中国视角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一种中国视角的古代西方研究,仍是摆在人文学者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要对古代西方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必要把西方古典学的最新成果介绍到中文世界来。可是学界目前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因学术积累有限,更因市场经济和学术体制官僚化条件下的人心浮躁,如今潜心做学问的人太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仍缺乏深度和广度,久久停留在肤浅的介绍层次。虽然近年来我们对西方古典学表现出不小的兴趣,但仍然远未摆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状态。甚至一些学术明星对希腊罗马了解也很不准确,会犯下一些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

西方古典学界每年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而且有日益细化的趋势——如某时期某地区妇女的服饰;如西元前4世纪中叶以降的雇佣兵情况;再如练身馆、情公—情伴(lover-the loved)结对关系对教育的影响等。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文明虽有不小的兴趣,但对文明细节的认知仍处在初级阶段。基于为囿考虑,拟推出“古典学译丛”,系统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较有影响的成果。本译丛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希腊罗马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十几年来我国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译介可谓不遗余力,成果丰硕,故宜选择专题性较强的新近研究成果和明显被忽略的古代著作)、习俗、体育、教育、雄辩术、城市、艺术、建筑、战争,以及妇女、儿童、医学和“蛮族”等。

只有系统地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才有可能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这些成果。只有在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西方成果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开启一种真正中国视角的西方古代研究。

阮炜

2013年6月29日

导读 民主不是希腊的专利

一个谬误存在已久,流传甚广,那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古代民主或 *democratia* 只是古希腊才有的一种独特现象,而其他民族的早期政制都是专制主义。然而,这是一个谬误,一个并不难证明的谬误。可是晚至 1980 年代,西方学界仍有人坚持认为希腊民主独一无二。^①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丹尼尔·E·弗莱明(Daniel E. Fleming)本着实事求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在其《民主的古代先祖:玛里与早期集体治理》^②(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 年)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即古代两河流域不仅存在着民主,而且在时间上比希腊还早 1000 多年。在其论述中,玛里王国的政制也许并非十分明显地具有人民大会、民众法庭一类雅典式的制度安排,但非个人专断的集体决策或协商决策机制是确然存在的,而由资

① Christian Meyer, "The Greeks: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 该文最初用德文发表于 *Saeculum* XXXIII, 1982, pp. 133—147, 载 P. J. Rhodes (ed.),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28—348。

② Daniel E.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Mari and Early Collective Gover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40—241。

深者组成的议事会来决定共同体重大事务的做法,更是一种标准的希腊式民主制度。这不是民主,是什么?

实际上,氏族形态的民主并非某个民族所独有,更不是希腊人的专利,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1933—1934年,安德列·帕罗(Andre Parrot)领导的一个法国考古队开始对两河流域西北部的玛里王国遗址 Tell Hariri 进行发掘。1935年,一座巨大的宫殿被发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大部分已知玛里王国档案已经出土。激起学界极大兴趣的是大约两万件楔形文泥板中的 3000 多封书信(用阿卡德语写成,该语言为通行于古代两河流域东部的一种闪米特语),其中不少是玛里国王与其他地区或城镇的统治者的通信,更有高级官员、地区总督、将军和部落首领写给玛里国王的数以千计的报告。

这些通信和报告提供了有关公元前 18 世纪早期两河流域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情况,^①其中就包括大量有关古玛里地区集体政体(collective polities)的情况。弗莱明《民主的古代先祖》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即便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政体已然在当地产生(毕竟两河流域享有一个适合农耕的大型陆地板块,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政体),民主性的集体治理仍然是两河流域西北部乃至整个两河流域通行的政治模式。

也就是说,在实际政治管理模式上,被很多西方人视为“专制主义”典型的“东方”帝国实行的是双轨制:一方面是帝国式的权力集中,或者说,各地方城镇或部落统统臣服于一个中央王国,有义务向王国统治者纳税并提供军役;另一方面各地方城镇、部落或小王国依然享有很程度的自治,其内部运作并非采用权力集中于个人的“专制主义”模式,而总体上遵循了一种以共同体意志为转

①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pp. 2—4. 并非所有地下古代文献已出土。从迄于 1980 年已发表的楔形文文献来看,这很可能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移的集体治理原则。

这种看法有何具体依据？作为一个专治古代两河流域史的学者，弗莱明给出了语言、宗教、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重要证据。

一个极引人注目的现象，或者说证据，是专有地名 GN (Geographic Name, 地理名称) 加上词尾 ites 以构成诸如 Imarites (伊玛尔人)、Tuttulites (图图尔人) 或 Urgisites (乌尔吉斯) 一类的词。这种用法的出现频率极高。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出现频率不太高但十分相似的表达法——the sons of NG, 即专有地名加上“儿子们”。例如，the sons of Imar, 即伊玛尔的儿子们，或 the sons of Tuttul, 即图图尔的儿子们。玛里地区的人们用这两种表达法来表示一个城镇、部落在与毗邻的城镇、部落的战争、和平或冲突中的集体行动。^①

这些表达法虽能表示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却并不能够明确表示该共同体的集体决策行为。从出土文献看来，进行集体决策的人常常是“长老们”。“长老”并非头衔，更不表示任何官职，而只泛泛地指共同体的资深者和年长者。他们不仅集体决策，也代表城镇或部落进行一般的对外交涉，尤其与西姆里-利姆 (Zimri-Lim) 的中央王国的代表交涉。跟世界上所有民族一样，这里的长老除对外交涉外，也负有司法和宗教职能。^②

然而，地名加词尾 ites 最多只表示一个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及其集体行为，长老多用来表示代表一个共同体进行对外交涉的资深者，而更能确切体现集体治理原则的，既不是地名加词尾 ites，也不是长老，而是“塔赫塔蒙” (tahtamum) 议事会。这种议事会只见于幼发拉底河中游河谷的伊玛尔镇和图图尔镇文献中。由于证

①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p. 177, p. 179, pp. 182—188 and pp. 188—190.

②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pp. 191—192.

据不足,其包容程度到底如何仍不清楚,但它是一种具有较大代表范围的集体性的决策机制,却没有疑问。

从一封图图尔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头人拉那苏姆(Lanasum)召开一次塔赫塔蒙会议之后,“该镇的儿子们”决定提供 30 名人员参与当地的治安保卫工作。从设好的座位或席位来看,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所以塔赫塔蒙应是一种长老议事会之类的机构。^①

从另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当西姆里-利姆的中央王国想以掳掠罪逮捕一些图图尔人时,却发现不通过塔赫塔蒙会议,就根本办不到。从另一封信中还可以看到,西姆里-利姆想要图图尔人提供劳役,但被图图尔头人以人手不足为由拒绝了,所给的解释是:“我召开了塔赫塔蒙会,跟他们讲了此事,但他们不从”。更有证据表明,伊玛尔镇和图图尔镇召开这种会议是自主行为,而非出于强迫。^②

除塔赫塔蒙议事会外,文献中还常出现 *puhrum* 和 *rihsum* 这两个表示会议的名词及相关动词形式。后者尤其被用来指镇与镇(或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协商或会谈(talks)。^③

此外,在玛里地区,围绕伊斯塔尔女神节的一系列祭仪也有强烈的团体色彩。祭仪包括伊斯塔尔庆典本身、拉蒙姆(ramum)祭礼(以一块纪念性石头为标志)、奈加尔(Nergal)祭礼,以及其他祭礼。这些活动鼓励全体成员参与,不仅仅有缅怀国王的祖先的意思,更有缅怀整个共同体祖先的意思。节日的主要庆祝活动被认为最初是由共同体的“儿子们”(即全体成年男性)发起。这完全可以视为集体治理政制在文化意识上的表现。^④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主的古代先祖》并非只讲公元前 18 世

①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pp. 207—208.

②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pp. 210—211.

③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pp. 208—209.

④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p. 211, p. 179.

纪早期两河流域西北部玛里地区的集体治理传统。从该书引用的其他研究成果来看,集体治理的政体并非局限于 18 世纪早期两河流域西北地区,其时间和空间范围要大得多,可以说存在于文明萌生以后整个两河流域和古叙利亚社会。

弗莱明提到,雅可布森早在 1943 年的研究便表明,在苏美尔(位于两河流域东南部,这里公元前 3500 至前 2000 年存在的文明为最早的人类文明)时期,各城镇中心便已出现了这样的政治样式:其最高权力并非被少数精英所垄断,而是不论财产、地位和阶级,掌握在“所有自由的成年男性成员手中”。此即雅可布森所谓的“原始民主”。^①

另据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出现了“强大的民间贸易力量”,有商人把锡和纺织品运到今日土耳其地区贩卖,以换取黄金白银。经济力量往往意味着政治力量,拥有雄厚财力的商人很可能也要分享政治权力。另外,还有证据表明,议事会一类机构不仅裁决案件,还有立法甚至行政的职能。^②

里查德·布兰顿及其同事有关古叙利亚(古代叙利亚地区很大,除现叙利亚版图以外,还包括伊拉克北部、约旦、黎巴嫩和以色列)北部的研究(1996)也很值得注意。他们认为该地区一直以来有着一一种强大的集体决策传统。这种传统沿自氏族制度,但晚至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500 年之间(此时国家已经产生),仍在国家而非氏族部落的政治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③

① Thorikild Jacobsen, “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 JNES2, pp. 159—172, 参见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pp. 15—16。

② 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李淑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1 页。

③ Richard E. Blanton, Gary M. Feinman, Stephen A. Kowalewski and Peter N. Peregrine, 1966, “A Dual-Process Theory for the Evolution of Mesoamerican Civiliz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37: 1—14, 参见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pp. 178—180。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的序和跋。从中可以看到,巴比伦王国最高统治者汉谟拉比不仅是一位君主,也是王国内各主要城市及其神祇的守护者。这些主要城市包括他刚刚从西姆里-利姆夺取的玛里。《法典》给人这样的印象:巴比伦国王竭力要在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小王国、城镇或部落间建立广泛共识,因此与其说汉谟拉比是一个令人畏惧、至高无上的征服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受欢迎的神遣的保护者。^①

然而,两河流域早于希腊 1000 多年便有民主,并不是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想法;而民主不是希腊人的专利这一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发现。早在《古代社会》(1877)中,摩尔根便基于人类学规律否定了希腊独特论。他认为在国家形成之前的原始条件下,氏族民主是古代人类群落普遍实行的制度,易洛魁人、阿兹台克人甚至有发达的前现代民主。

易洛魁人的“国家”或部落联盟由 5 个地位完全平等的同宗部落组成,虽统辖在一个共同政府之下,但各部落内部事务均由它们自行处理。联盟设立一个首领全权大会或联盟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各部落选举产生的 50 名首领组成,名额分配有限制,但其级别和权威是平等的。这与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十部落各选 50 名代表轮流主持五百人政务会相似。

在联盟大事上,首领全权大会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投票,每个部落都可以对其他部落的动议投反对票,但各个部落在投票之前必须举行一次内部会议,也可能以投票的方式来做出在全权大会上持何种立场或如何投票的决定。联盟层面的公共法令必须得到联盟会议的一致通过方才生效。任何人都可出席全权大会,在会上

① ‘Prologue’ and ‘Epilogue’ to *The Code of Hammurabi*, <http://www.thenagain.info/Classes/Sources/Hammurabi-Prologue.html>; 亦可参见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p. 228.

发表演说,讨论公共问题,但最终决定权却在大会。^①这不是民主,是什么?

至于阿兹台克人的民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其“国家”或部落联盟层面的酋长会议。这是一种随氏族产生的集体决策机制,代表各氏族中的选民,自古以来就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力,是共同体的最高权力机构或统治机构。^②

像希腊城邦有军事统帅巴塞勒斯那样,阿兹台克联盟设有“吐克特利”,即军事酋长的职位。吐克特利是酋长会议的一员,有时被称为“特拉陶尼”或“议长”。出任此职者由选举产生,也能通过选举罢免。这意味着,最高军事权力仍掌握在人民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吐克特利在战场上的权力虽很大,但重大战略决定则仍由酋长会议决定。^③

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一书中便记载,前8至前4世纪的迦太基便实行与希腊相当的有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民主。亚氏固然对贵族政体情有独钟,但在他笔下,迦太基政体不仅是一种选贤任能的“良好政体”,而且是一种集贵族制、民主制和寡头制优点于一身的混合政体;当“偏离走向民主政体”时,人民大会的权力非常大,即便王者和长老两方面意见一致,也有权将其意见抛在一边,自行做出“最后的决断”;甚至人民大会任何成员都有权反对王者和长老提出的议案。^④以今日标准看,这不是民主,是什么?

问题是,中国古代有没有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对文革仍然心有余悸,因此有一种倾

①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单卷本),杨东莼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②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63—166页。

③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72—175页。

④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2b 30—1273b 20。此处所用版本为《政治学》,苗力田主编,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向,即不承认 19 世纪以来人类学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承认中国史籍中明明白白记载的事实,而一口咬定夏、商、周早期国家全都是“专制主义”,^①全然不顾夏之前曾长期存在禅让制。

只要不拘泥于形式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而是将民主理解为一种协商和分权机制,或一种集体性质的决策传统,而非一种个人专权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则不仅早期华夏根本不缺乏民主,而且晚至春秋早中期,议事会、人民大会之投票表决意义上的氏族民主仍然存在于华夏世界,尽管很可能没达到前 5 至前 4 世纪雅典式民主的激进程度。^②

儒家强调尊卑上下,君臣秩序,但即便在《尚书》中的《尧典》和《皋陶谟》之类被视为上古文献的文典中,也不难发现华夏早期国家统治者聚在一起,和谐平等地集体决策的记载。从这些文典中,可以看到他们召开政务会,畅所欲言地商讨邦国大事;看到他们审慎考察、议定共同体最高职位(即“元后”继承者)的人选,用心良苦地举贤任能;议事者们表达自己意见时无需看“帝”之脸色,而“帝”之采纳他们的意见也并无居高临下之意。这难道不可以视为一种“协商民主”?

以上只讲到汉族的古代民主。我国少数民族有没有他们的民主?

当然有。晚至 20 世纪初,鄂温克人仍保留着氏族形态的原始民主:“凡属公社内部的一些重要事情都要由‘乌力楞’会议来商讨和决定;会议主要是由各户的老年男女所组成,男子当中以其胡须越长越有权威。”^③很明显,这里的“乌力楞”会议就是长老议事会,

①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2 页。

② 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86—98 页。

③ 秋浦等著,《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62 页,转引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 页。

是一种许多民族历史上都存在过的典型的氏族民主机构。

凉山彝族社会的民主更值得注意。1956年“民主改革”以前，凉山“黑彝”社会明显存在氏族形态的民主：

每个家支都有数目不等的头人，彝语称为“苏易”和“德古”。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或任命的，因为他们精通习惯法，善于权衡阶级关系和家支势力的消长，所以他们被黑彝奴隶主拥戴出来……不论“苏易”和“德古”，如果排解纠纷一旦显出不公允，就会失去威望，也会失去头人的地位。头人没有固定的薪俸，也没有高踞于一般家支成员之上的特权，他们的地位也不世袭……家支除头人外，还有家支议事会。议事会分为“吉尔吉铁”和“蒙格”两种。凡是几个家支头人的小型议事会，或邀请有关家支成员商讨一般性问题的会议，称为“吉尔吉铁”；家支全体成员大会称“蒙格”。“蒙格”由黑彝家支中有威望的头人主持，与会者都可以发表意见。当发生争执时，头人和老人的意见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凡经会议决定的事项，家支成员都得遵守。^①

事实上，晚至1950年代中期，凉山彝族社会不仅仍有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议事会，即“吉尔吉铁”，甚至仍有完全意义上的人民大会或公民大会，即“蒙格”大会。从每个家支有不止一个头人和与会者可以发表意见来看，召开“蒙格”大会时，家支成员的参政程度完全达到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激进民主中人民大会的水平。

所以，应当承认，在现代资产阶级和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前，

^① 吴恒，《凉山彝族家支制度》，《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亦可参见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3—464页。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较小的政治单位发展为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共同体——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或早期国家，由较小的早期国家而较大的国家，直到最终成为跨地域、跨文化的地缘共同体或超大帝国——以因应政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求得越来越大范围的和平与安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意味着越来越高水平的政治整合，而更高水平的政治整合又意味着个人和较小社群必须向国家交出越来越多的自由。这当然也可以视为一个去(氏族)民主化过程，一个从较低社会发展水平到较高社会发展水平演进的过程。

然而，在18世纪末以降的欧洲，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民主迅猛推进，致使欧洲人将现代民主意识形态化，以为只有欧美样式的民主才具有普世性，才是唯一正确或“正宗”的民主，并且顺带衍生出一种罔顾事实、非常片面的古代民主观。清末民初，似是而非的欧美民主观播散到中国，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持续至今。

因时代局限，五四一代人汲汲于救亡图存，来不及深思西方民主观，来不及详察古典时代直至19世纪末欧美民主话语的历史背景和实质，便将其全盘接受，以至于流毒至今，很多人仍分不清真假是非。现在，是时候纠正谬误了。

阮 炜